

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

刘 旭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序章 现代性话语笼罩下的底层·····	1
---------------------	---

第 一 部 分

第一章 近现代底层形象的变迁 ·····	31
第二章 彩票：底层致富幻象一种 ·····	52
第三章 吃饱之后怎样 ·····	68
第四章 底层婚姻：在现代与封建之间 ·····	80
第五章 底层人格：在可爱与可恨之间 ·····	94

第 二 部 分

第六章 文学中的底层形象与精英意识·····	107
第七章 “落难精英”与“劳动”女性·····	125
第八章 远离农民的高晓声·····	139
第九章 市民小说：高度庸俗化的精英叙述 ·····	176

终章 底层的“真”表述·····	199
------------------	-----

附录一：对蔡翔的访谈	210
附录二：对王晓明的访谈	229
参考文献	250
后记	257

序“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高瑞泉

现代性研究在当今中国可谓方兴未艾,尽管“现代性”本身已经绝对算不上新鲜的话题。坊间正流行着各种各样翻译介绍西方学者的现代性批评论著,从哈贝马斯到查尔斯·泰勒,从福柯到夏尔·波德莱尔,说明“现代性研究”本身作为对现代现象的总体性反思,如何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和热情。同时也展示了现代之后的世界,精神之芜杂和意向之分歧。不过,我们组织编纂出版这一套“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刊,并非只是泛泛地参与到对时代核心问题的讨论之中,而是自觉地意识到现代性研究中两个相互勾连的环节:第一,“中国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视域中的人文学术。它们构成了本丛书所措意的核心对象,希望以此为中心来贡献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中国的现代性”的概念,以多元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之存在为前提。与早期的现代性研究者的观点不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单一性不是现代性的正确摹写。哈贝马斯说黑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不过 18 世纪的黑格尔不仅是一位

欧洲中心论者，而且是德国中心论者，中国则完全在他的总体历史之外。本世纪第一年，哈贝马斯应邀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在午宴上盛赞中国，说他站在东方明珠顶楼眺望上海，感到自己正在“世界的中心”(the center of the world)。让人领略这位理论大师在社交场上的机敏与魅力，也让我们这些东道主的虚荣心得到无伤大雅的满足。当然“中国的现代性”之被重视，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经济起飞或“中国崛起”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还因为我们对中国经济具有的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经济现代化的历程，不但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了更合乎辩证法的理解，而且真正面对了哈贝马斯所说的那个历史节点：只有当经济合理性和官僚合理性(即认知—工具合理性)明显占据统治地位时，现代社会的病症才会暴露出来。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与世界日益被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相比，使用文化概念来重塑本土现代性的努力是无足轻重的。譬如詹姆逊就认为，人们谈论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的现代性、非洲的现代性和儒家的现代性等的时候，会忽略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当讨论到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的时候，许多人会实际上承认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现代性：詹姆逊就几乎同意约翰·格雷(John Gray)的说法，即世界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引起普遍的文明，如像斯密和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它允许种种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不同于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彼此之间也互不相同。它造就的政权通过恢复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获得现代性，而不是模仿西方国家。因此有多种不同的现代性，就像在现代化过程有多种失败的方式一样。

与单一现代性理论所依靠的历史单线进化论预设相反的是，二次大战以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出现了另一种状况，渐渐实现现

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或社会,大多拒绝了与现代西方完全同质化的道路。一方面市场经济、民主化、个人主义、家庭变化、都市化、工业化、现代教育、大众传媒,到处都看到西方化的影子。另一方面,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的那样:这些东西得到的定义和组织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建制类型和意识形态并不相同,所以多重现代性是对这样的客观情势的一种肯定性描写;诸多文化规划不断得到建构和重构。从全球看,在现代和现代化的社会里,在现代化的各个阶段甚至可以看到更加多样的具体的制度类型。作为一个东方大国,近代中国尽管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但并未真正沦为殖民地国家;她的悠久而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在与殖民主义对抗的过程中,成为民族意识的强化剂,它曾经与意识形态的目标相结合,或者直接诉诸文化创新的力量,来改写现代性的社会设计。更进一步说,现代性研究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及其发展前景内在问题的知识化过程,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基本和永恒的若干问题在当下条件中的自觉,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理性规划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应当在它的历史向度中表达当代人的批评精神和理论创造。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深入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之迫切与重要,并且已经有若干重要著作问世;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的现代性”的专门研究,总体上远不及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介绍和翻译之规模。因此,将中国的现代性作为本丛书的研究对象,自然表示了一种提倡和一份努力。

把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与人文学术发展联系起来,是本丛书的又一重目标。众所周知,现今中国的人文学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经过 20 世纪的转变,尤其是取法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科学,由此纳入现代学院体制,成为现代学术形态的知识系统。如果我们同意现代性是特定社会现实和特定世界观的结合的

话,那么人文学术多多少少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现代性的自我确认,至少表达了现代性自我确认的努力。我们知道,现代人文学科的形成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密切联系,现在汉语称做“人文学”,英文翻译为 the Humanities 的那些科目,在 15 世纪意大利指的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这一套科目,它们当然也包括了要学这些科目就必须具备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知识。虽然直到 19 世纪初才出现“人文主义”一词,但是后来人们普遍接受了像布克哈特那样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将人文主义用于他们认为与古典学问的复活有关的新态度和新信念上,即将现代人文学科中的新态度和新信念称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显而易见,西方人文主义,不管其普遍性如何,都不是价值中立的知识。事实上,数百年来,以欧洲现代性为中心的世俗化人文主义无论在知识上还是在道德上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动。

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人文学术当然有她悠久而伟大的传统,但是以古代“四部”之学为内容的传统学术,早就经历了 20 世纪的巨大变革,虽然并未完全变成绝学,毕竟已转变为现代学术的知识形态。且不说,当代中国精神的主流已经是这两股变动之流的不同程度的融合,即使是人文教育中引人注意的中国经典阅读的新实验,也实际上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对古代经典做现代诠释。这种诠释或者是强调中国的人文传统具有民族特点的人文主义原则,或者是用一种普遍的人文主义来解释中国经典。无论是关于重写学术史的呼声,还是若干年前开始的对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回顾,其实都体现了对人文学术的反省意识和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创造。它的最近走向似乎与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之旨趣有某种内在的契合。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现代性的自我矛盾、自我分裂,在人文学

术的处境变化中获得充分的表露。西方人文主义并未能幸运到能逃避其内在矛盾的发展,因而它自身就是分裂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是“人”,它转变成现代性的哲学表达就是主体性,但是后现代主义今天不但宣称哲学根本上要放弃追求那个大写的“真理”,主体性消失了,甚至说“人已死了”。与此相伴的是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自然科学特别是技术与市场机制的扩展,迅速地改塑着人文学科的空间,即使是学院体制内部也不能幸免。人文学术今天的悖论是:一方面人类因为迫切需要生产一种创新文化和提供作为选择的独特生活方式而特别需要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知识生产不仅受制于内部的观念冲突,而且受制于外部的生存条件。如何破解这个悖论,实在是现代性研究的关键之一。

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提示了巨大的研究空间,本丛书以此为目标,并不表示怀抱着短时间内就对它展开全面研究的雄心,而只是在提倡以一种持续、局部的具体问题之研究,尝试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地逼近这个目标。对于中国的人文学者而言,无论是中国的现代性,还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学术,都是道地的“为己之学”。所以我们不但相信,假以时日,这项研究一定可以积微为著,有助于我们整体理解现代性而且相信即使是局部的,以个案为中心的工作,也自有其内在的价值。

序章 现代性话语笼罩下的底层^①

文学始终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当我们翻开小说,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便展现在眼前。当前中国被形容为又一个鲁迅所称的“大时代”^②,这种身处社会转折关键点的历史感和伟大感正是轰轰烈烈的二十多年“现代化”改革进程的直接后果之一,在这个时代,世界越发一体化,中国也日益全球化。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公有化之后,贫富分化重新出现且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甚至有被合法化的趋势;同时,在表面的经济繁荣之下隐藏着躁动不安的潜流,正是这种不安让敏感的人们时时有一种“大时代”的悲壮感。在现代性话语的笼罩下,当前人们的精神状态有一种不正常的统

① 关于现代性(Modernity)话语(Discourse)这一概念,本文采用汪晖的界定,指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汪晖认为,现代性概念产生于欧洲,它首先是指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现代性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在欧洲,现代性是和世俗化过程密切相关的,因此,它集中地表现为对理性的崇拜,对经济发展、市场体制和法律/行政体制的信仰,对合理化秩序的信念。参见汪晖、柯凯军《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收入《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124。

② 称当前的中国为“大时代”,见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导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1。鲁迅关于“大时代”的论述,可参见鲁迅《〈尘影〉题辞》(1927),《鲁迅全集》第3卷,收入《家庭藏书集锦》之中国文学卷一,红旗出版社1998年,页564。

一，即不管是穷人还是处于中上层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人们，都被一种暴富欲望鼓噪，对他人尤其是对穷人的关心似乎已经可以合法地搁置一边，这样的“现代”与文明似乎越来越远，所以，人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动荡感：人数庞大的底层民众如何向这样的“现代”争取一点自己的文明？文学作为社会的忠实反映者，众多的作品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融入了“大时代”的动荡感，对现代性话语下的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表述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①，研究和分析文学中的底层形象也成了当前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

与底层相关的几个概念

“底层”一词最早出现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 Gramsci)的《狱中札记》中，他用了 Subaltern Classes 一词，可译成“底层阶级”，从书中看来，葛兰西用“Subaltern”来意指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他的“底层阶级”主要指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这么推究，农民的生活向来比工人水平更低，所以农民也理所当然地归于底层。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底层必然又有了新的内容，容纳了更多的边缘群体。

在中国，底层研究是个新兴的课题，相当多的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方面涉及到底层研究，推出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

^① 对于“表述”概念，本书参照雷蒙·威廉斯的说法，其英语为“Representative”，又可译为“象征”、“再现”，在代议制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又有“代表”的含义，本书在“再现”、“代表”的意义上使用该词，它意味着所有的文字存留都被取消了真理性，都成为多少带有点主观色彩的个人性的话语。参见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北京三联书店 2005 年，页 406。

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底层研究处于零散化的状态,缺乏系统性,单从概念来讲,“底层”本身还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词汇,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在社会学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在 2002 年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①,其分层依据为对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尽管相当客观,但其中哪几个阶层归为底层?使用“阶层”和“底层”两个概念来解释当前的社会结构,又会掩盖什么?这种掩盖又说明了什么?这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也是陆学艺等的阶层分析和此意义上的“底层”概念备受争议的原因。“底层”一词的源头不在中国,“底层”在中国最早出现时也与国外理论中的“底层”无多大联系,这是一个直接指向“弱势”群体的直观概念:所谓底层,就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这是个不需要思索的概念,处于“最下层”就是划分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内容如果再详细一些,可能包括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困窘、文化上教育程度低等,被称为底层的,可能是三个条件全部满足,也可能只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凭着直觉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底层,做出这种判断可能很容易,也可能很困难,因为每个个体的情况是不同的。蔡翔的《底层》一文中较早提出“底层”一词^②,他的判断就是相当文学性的,也就是相当情感化的,他文中的底层主要指的是工人,那些生活在苏州河边棚户区靠体力劳动生存的人们当然属于底层,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地位都至少处于城市的最下层。社会主义建立后,这些人搬进了社会主义新村,做了国家的

① 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② 蔡翔《底层》发表于《钟山》1996 年第 5 期,收入蔡翔《神圣回忆》,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

“主人”，但在“文革”中他们突然又感觉自己生活在底层，就因为他们“在‘文革’中‘抄家’时发现有一部分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对比自己的食不果腹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将自己归为‘底层’”。改革后，对于那些穿着仿貂皮大衣、手牵宠物犬作贵妇状散步于肮脏的贫民区的妇女，人们又不知道她们是否属于底层。这种底层的划分是相当原初化的，底层研究进入学院之后，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国外与底层相关的理论不断引进，研究也不断深化。陆学艺的阶层划分明显地借鉴了西方的阶层研究方法。西方有两种社会分层观，一种是定性的阶级划分思路，这种思路假定社会上某些人占有资源，另一些人占有资源，前者对后者进行压迫、剥削；另一种是定量的层化思路，即假定大家都占有资源，但有多少之别。《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十大阶层的划分就使用了第二种较温和的思路。

总之，底层的界定牵涉到中西理论、国内的社会现实、底层心理上的自我认同等问题，现有的划分需要进一步学术化，国外的相关理论首先需要借鉴和梳理。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底层阶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著作里的“无产阶级”也是与“底层”密切相关的“历史”名词之一。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葛兰西的“底层阶级”所包含的人群要大于“无产阶级”，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中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其他被压迫阶级或阶层，比如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无业者等。葛兰西之所以用“底层”一词，自有他的深意。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展在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取得仅仅靠无产阶级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就包括了上述阶级和阶层，只有取得了众

多阶层的支持,才有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胜利,才有进一步夺取政权的可能。所以,“底层”这个词语容易取得各阶层的认同感,以无差别的统一称谓或命名将尽可能多的力量整合进革命队伍。马克思由于对暴力革命的强调而相对弱化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所以马克思一直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和领导地位。在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与葛兰西的底层相关。列宁在总结了苏联革命的经验之后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①:党不仅要在政治领域建立领导权,在组织上和文化领域也要建立自己的领导权。强调文化领域的斗争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算是从马克思主义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形成的一个过渡环节。从底层研究来看,葛兰西“底层”概念的形成无形中有对另一个马克思主义重要概念的弱化,那就是“阶级”。

“阶级”在马克思那里是个革命性的概念,阶级分析方法把社会分两大对立集团,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阶级按照职业来划分,革命主力和领导者为工人,同盟军为农民。马克思的阶级本身就包含一种强烈的底层民众暴力翻身的期待,“革命”是阶级最主要的内涵。“底层”一词映射在现实中就包含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层,尽管葛兰西在文中仍然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但在这个无差别的集体称谓下,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阶级”概念在某种程序上不可避免地被弱化了。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之一,它是作为历史前进的动力被不断强调的,无产阶级或者全世界被压迫者的解放也要依赖它才能完成;

^① 参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收入《列宁全集》第12卷,《家庭藏书集锦》之领袖著作卷,红旗出版社1998年,页115。

如果弱化了“阶级”，阶级斗争的作用也就无形中被削弱了。

底层研究中还经常会涉及到“他者”一词。可以说，底层在所有的时代都是“他者”化的，而且是沉默的他者。与底层相关的“他者”不是萨义德“东方主义”意义上的全民族化的他者，它更接近于福柯的权力的对立物。底层常常是权力存在的合法性的证明者，这个证明的过程必然是由权力者完成，底层在沉默中成为一种反衬物。研究底层，“他者”是一个很有生产力的方法，对于研究底层形象如何被塑造出来非常有效。印度底层研究的基本方法与他者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重在底层如何被表述。印度“底层”指涉的群体相对明晰，它包括种姓制度中的贱民，也包括从现代职业标准划分出的工人和农民等。

2000年出版于美国纽约的《帝国》推出了另一个与底层相关的重要概念“群众”(Multitude)^①，群众包含的人群比底层更丰富，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各种群体都可能成为“群众”，它指涉的群体包括社会的下层及其他被压迫的群体。“群众”将“阶级”消弭得更彻底，按照《帝国》一书的观点，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的作用，实际是人为地制造了穷人之间的等级，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革命过程中工人和农民的矛盾上，革命成功后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显示出来的不平等更是显而易见。而组成群众的各个群体的利益则是平行的，他们的利益要求常常比较特殊，比如同性恋群体、女性主义群体、各种宗教团体以及工人、农民，甚至从事不同的工种的工人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群体，这也决定了他们都是各自分割的，从这点来看，群众似乎没有联合起来斗争的可能。

^① 《帝国》，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著，韦本、李尚远译，(台)商周出版社2002年。

中国的底层一词有着比较明确的定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①按此计算,底层的数目相当庞大: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产业工人阶层为 22.6%左右,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和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为 44%左右,失业、半失业人群约为 3.1%,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约为 12%,这样,底层占到全国人口的 78.7%,以全国人口 13 亿计算,就是 10.23 亿^②。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社会学定义,划分标准也相当客观,可以说在世界底层研究中对“底层”的定义也是少有的明确。这一底层定义也完全抛弃了在中国使用了 80 年的阶级分析方法,不用说“无产阶级”和葛兰西的“底层”,就是与“他者”、“群众”和印度的“底层”相比也几乎没有了批判性,因为在中国,这个影响巨大的学术团体推出的底层是完全结构化的,就是说,此研究的出发点是:只要有人群的存在,就必然有上、中、下三等,底层形成是完全自然的,因而也是合理的。

从上述与底层有关的概念来看,被压迫阶级、底层阶级、群众、他者等虽然所指各有不同,但有一部分是重合的,那就是工人、农民和其他下层劳动者,这些群体的总人数也占了上述概念所指人群的绝大多数。从当前来看,给底层一个精确的定义似乎比较困难。因为除了包含群体的日益复杂,底层还面临意识形态化和工

① 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页 48。

② 此数据中去掉了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以最大数 25%计算,则减掉 3 个百分点,底层的比例由 81.7%降为 78.7%。

具化的问题，这给底层蒙上了政绩化和商业化色彩。在此似乎应该避免给底层一个定义，上述这些概念所指虽然基本一致，但并非仅仅是指包含的人群，而且包含着其他更复杂的东西，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这些概念背后的东西。比如，底层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到底处于何等的地位？

现代性话语的个体性与 非人化的交织

全球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的 21 世纪初的中国，一些经济学专家为了解决大城市交通堵塞问题，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禁止自行车上街，另一些专家从环境问题出发得出了一个结论：自行车比汽车更污染环境^①。为了城市的治安、环境等问题，还有大学教授建议建立城市准入制度以禁止农民进城打工，甚至建议人民代表大会为此立法^②。这样的观点的出台并非荒谬可笑。从那些进入“现代”的中产者和富豪、权力者来说，自行车确实是他们行路的一大障碍。如果没有了自行车，他们的路不就更宽了吗？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总是要好得多。至于自行车比汽车更污染

① 见《“自行车比汽车更污染”是什么科研成果》。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内一家搞环境研究的权威机构，经过一番科学调查与研究后，得出一个“科学”结论：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何以会比汽车更污染环境？1月26日召开的首都科教界“培育学术生态，净化学术环境”座谈会上，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王浦生道出了其中奥妙。原来，这个环境研究课题是由一家汽车公司赞助的。参见<http://news.qq.com>，2005年02月02日。

② 可参见陈映芳《关于“城市准入制度”提案不能不说的一些话》，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focus/200502/652.html>，2005-2-7。阿赛尔《浅薄的张维英和双轨的中国》，博客论坛，<http://bbs.blogchina.com/p258402.html>，2005-1-26。

环境,那个从汽车商那儿拿了不少好处的“专家”的“逻辑”估计是这样的:自行车道挤占了汽车道的空间,造成了汽车的堵塞,汽车行走缓慢,行走时间拉长了 N 倍,废气排放量大增,空气污染自然要大上好几倍,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自行车。自行车不是比汽车更污染环境吗?如果自行车统统消失,汽车道加宽了一倍,汽车们来去如飞,既减少了废气排放又节省了汽油,环境能源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这样的逻辑虽然过于曲折,但很合那些富人和汽车商的口味。从人道主义方面来讲,这却非常残忍。如果真的实行,实际就剥夺了一大部分人的生存空间,那些勉强生存在城市的人们,多数属于底层,不可能有钱买车,又感觉每月一两百元的公交车费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只能以自行车代步,如果不准自行车上街,直接后果是提高了人们的生存成本,甚至会有相当部分的人们失去赖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从整个社会对底层的排斥来说,这种心理绝不是少数几个人才有的。即使是同样的社会底层人物也会有这种思想。城市的底层,比如工人,他们对更低的底层比如农民工的敌视不亚于那些富人,甚至会强于那些富人。禁止农民工进城与不准自行车上街虽然是极端的例子,目前看来也不太可能真正实行,但这种面对权力和物质的媚态却非常典型和“现代”。现代社会产生的几百年以来,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和讨论已经非常充分和深入,19 世纪中期马克思就已经很全面地研究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异化与反人类特征。当代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思考更加直接:

在被金钱渗透的这个领域之外,没有任何事物、没有“赤裸裸的生命”,没有外部的观点能够被提出:没有事物能够逃离金钱。生产与再生产被披上了货币的外衣。事实上,在全球的舞台上,所有生物政治的形貌都是以货币的装束而出现